

# 俄国使团使华笔记

(1692—1695)

〔荷〕伊兹勃兰特·伊台斯 著  
〔德〕亚当·勃兰德

商务印书馆



# 俄国使团使华笔记

(1692—1695)

〔荷〕伊兹勃兰特·伊台斯 著  
〔德〕亚 当·勃 兰 德

北京师范学院俄语翻译组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80 年·北 京

**Избрант Идес  
и  
Адам Бранд  
ЗАПИСКИ  
О РУССКОМ ПОСОЛЬСТВЕ  
В КИТАЙ  
(1692—1695)**

Главная редакция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67

2114 / 13

**俄国使团使华笔记**

(1692—1695)

〔荷〕伊兹勃兰特·伊台斯 著

〔德〕亚当·勃兰德

北京师范学院俄语翻译组译

---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 11 1/4 印张 1 插图 265 千字

1980年6月第1版 1980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11,800 册

统一书号: 11017·470 定价: 1.10 元

## 目 录

|                |     |
|----------------|-----|
| 俄文版编者的话        | 1   |
| 俄文版前言          | 2   |
| 俄译者的话          | 44  |
| 第一章 从莫斯科到亚洲边界  | 47  |
| 第二章 在楚索瓦亚河上行进  | 67  |
| 第三章 托博尔斯克      | 75  |
| 第四章 额尔齐斯河      | 87  |
| 第五章 纳雷姆        | 94  |
| 第六章 从鄂毕河到叶尼塞河  | 103 |
| 第七章 在安加拉河上     | 115 |
| 第八章 贝加尔湖       | 127 |
| 第九章 过了贝加尔湖     | 139 |
| 第十章 达斡尔地区      | 154 |
| 第十一章 满洲、齐齐哈尔   | 167 |
| 第十二章 蒙古        | 177 |
| 第十三章 长城。去北京的路程 | 184 |
| 第十四章 北京、博克达汗赐宴 | 194 |
| 第十五章 博克达汗及其宫廷  | 211 |
| 第十六章 离开北京      | 224 |
| 第十七章 又到蒙古      | 239 |
| 第十八章 经西伯利亚到莫斯科 | 244 |
| 第十九章 萨莫耶人      | 253 |

|                                              |     |
|----------------------------------------------|-----|
| 第二十章 略论西伯利亚和中国.....                          | 260 |
| 出使报告.....                                    | 280 |
| 附 录.....                                     | 305 |
| 伊兹勃兰特·伊台斯使团成员.....                           | 305 |
| 伊兹勃兰特·伊台斯使团的日程和路线.....                       | 307 |
| 使团在北京期间活动日志（按照出使报告整理，并根据伊台斯和勃兰德的笔记作了补充）..... | 309 |
| 伊兹勃兰特·伊台斯和亚当·勃兰德笔记的各种版本。                     |     |
| 有关使团的资料.....                                 | 312 |
| 关于使团的俄国档案材料.....                             | 325 |
| 关于使团的中国文献资料.....                             | 327 |
| 文书.....                                      | 329 |
| 俄汉译名对照表.....                                 | 333 |
| 译后记.....                                     | 351 |

## 俄文版编者的话

本书系伊兹勃兰特·伊台斯于1692—1695年奉彼得一世之命率使团出使中国的笔记的准确而完整的新译文。伊台斯的笔记是俄中关系史的珍贵文献，也是世界地理文献的经典作品。本书除收入伊台斯的笔记外，还收入该使团秘书亚当·勃兰德单独出版的使团记述。前者主要记叙西伯利亚各民族的生活习惯和经济情况，后者则几乎完全是记述在中国逗留的情况。

责任编辑 B. B. 卡芬加乌兹和 B. C. 米阿斯尼科夫

## 俄文版前言

M. И. 卡扎宁

1692年莫斯科派遣以伊兹勃兰特·伊台斯为首的使团前往中国。亚当·勃兰德是使团的成员之一。往返路程及在北京停留的时间持续约三年。从中国归来后伊台斯和勃兰德分别在西欧发表了出使笔记。

### I

我国的历史和地理文献中常常把伊兹勃兰特·伊台斯简称为伊兹勃兰特，但是他的著作的出版者以及所有西欧的译者都认为伊兹勃兰特是名，而伊台斯是姓。在我们的译文中则常常称他为伊台斯，以免与勃兰德混淆，由于巧合，两者的姓很相似。

伊兹勃兰特·伊台斯的传记资料在外国文献中极为贫乏。在刊印的书籍中第一次提到他是在荷尔斯泰因学者约翰·莫勒(1661—1725年)<sup>①</sup>的文学传记著作中。莫勒在该书中评介了以某作品驰名文坛的两位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人(伊台斯和勃兰德都出生于该地)，列举了伊台斯笔记的各种版本及对这些版本的评论，但对伊台斯本人则仅仅提到他是格吕克施塔特人，曾率领使团出使中国，并发表过一本出使中国的书，1700年仍在世。

其他图书学家对此也未能补充任何新材料。约赫尔<sup>②</sup>的简记

---

① J. 莫勒：《西姆柏文士传，或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两公爵领地文士传三编》，哈尔尼，1744年版，第257页。

② C.G.约赫尔：《学者人名辞典》，5，莱比锡，1750年，第1923页。

则完全重复莫勒的资料,只是改变了名字的写法;莫勒的写法是埃别尔加尔德·伊兹勃兰特·伊台斯;约赫尔的写法是埃别尔加尔德·伊兹勃兰季台斯。十八世纪末他的笔记译成俄文,在俄译本中我们可以见到伊台斯这个名字的另一种写法(见本书俄文版第374、375页)。

十九世纪的德国大地理学家 Ф.拉采尔(1844—1904 年)对约赫尔的写法提出了异议,他建议仿效伊台斯笔记的出版者 Ф.加尔马(阿姆斯特丹,1704 年),按荷兰文将伊台斯的名字写作埃费尔特·伊斯布兰茨·伊台斯。勃兰德则在自己的笔记中称伊台斯为埃别尔加尔德·伊兹勃兰德;伊台斯本人在书前致副总理大臣沙菲洛夫的献词后署名为埃贝尔·德·伊兹布兰德·伊台斯。1789 年诺维科夫在莫斯科出版的伊台斯笔记俄译本中称伊台斯为埃别尔加尔德·伊兹勃兰涅台斯,而在俄国国家文献中则称之为叶利扎里·叶利扎里耶维奇·伊兹勃兰特。伏尔泰和 A. 戈尔顿称伊台斯为伊利勃兰德·伊德<sup>①</sup>。

在贝克曼的图书评论著作中<sup>②</sup>伊台斯和勃兰德的传记写得稍为详细些。拉采尔推测,伊兹勃兰特·伊台斯虽然出生在荷尔斯泰因,但看来他是荷兰人,经营商业。拉采尔所写的关于伊台斯的文章,十分之九不是评述作者,而是评论他的书<sup>③</sup>。

1905 年汉宁<sup>④</sup>在他叙述西伯利亚历史地理的著作中,以很大篇幅谈到伊台斯和勃兰德。汉宁并不满足于在他之前西方文献所

---

① 见伏尔泰:《彼得大帝时代的俄罗斯帝国史》,I,巴黎,1761 年,第 167 页;亚历山大·戈登·冯·阿申土尔:《彼得大帝传》,I,莱比锡,1765 年,第 101 页。

② J. 贝克曼:《早期旅行记汇编》,I-II,格廷根,1809 年(关于伊台斯,见 II,5,第 447—462 页;关于勃兰德,见 II,第 463—464 页)。

③ 《法国名人综合传记》,XIII,莱比锡,1881 年,第 747—749 页。

④ G. 汉宁:《从汉尔贝斯坦到伊台斯关于西伯利亚的旅行报道》(《莱比锡地理学会通报,1905 年》,莱比锡,1906 年),第 312—394 页。

占有的贫乏资料，他借助荷尔斯泰因的地方档案，得到了有关伊台斯出生和受洗礼的确凿材料，但是由于他没有机会利用俄国资料，他所知道的关于伊台斯的情况并不更多。

根据俄国资料研究早期俄中关系史的法国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加恩对伊台斯的生平有较为详细的叙述。加恩在莫斯科档案中阅读了伊兹勃兰特的奏文（在奏文中他请求彼得派遣他出使中国）、使团的出使报告及其他资料。根据这些资料他更确切地阐明了伊台斯生平最重要的几个阶段<sup>①</sup>。

按照时间顺序，最后一份材料是捷克学者库尔菲尔斯特<sup>②</sup>所写的关于伊台斯生平和事业的详细评传。

如果注意到伊台斯所属民族这一同样也很混乱的问题，那就不难解释伊台斯这个名字的各种不同写法了。

伊台斯是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的格吕克施塔特人，因此德国的研究家们十分肯定地认为伊台斯是德国人。亚当·勃兰德写道，伊台斯属于“日耳曼民族”。但是伊兹勃兰特这个姓说明伊台斯的祖先是荷兰人。在荷兰，姓伊兹勃兰特的人很多。伊台斯本人在给彼得一世的奏文中写道：“我出生于丹麦。”伏尔泰称他为丹麦人。

分别研究了他所属的民族和国籍，就能解决他属于哪个民族这一问题了。正如拉采尔所写的，伊台斯出生在一个十七世纪就已迁到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sup>③</sup>的荷兰人家庭。显然，他在

---

① G. 加恩：《彼得大帝时代俄中关系史，1689—1730年》，巴黎，1912年，第81页。

② F. 库尔菲尔斯特：《十七世纪末和十八世纪初的捷俄关系》，布拉格，1936年，第87—88，113—115页。

③ 当时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有许多荷兰人。荷尔斯泰因东部的弗里德里希施塔特城完全是荷兰人建立的，该城河道纵横，很象荷兰城市（K. 克尔斯滕：《彼得大帝》，阿姆斯特丹，1955年，第118页）。

家里讲祖国语言荷兰语，但书写则用德语。中国皇帝康熙曾问伊台斯通晓哪几种语言，伊台斯在回答康熙的垂询时，在他通晓的语言中举出了荷兰语。但是他旅游中国的笔记却是用拙劣的德语（汉堡或下萨克森方言）写的，编辑他的作品的维特森曾抱怨过这一点<sup>①</sup>。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在十七世纪成为各日耳曼公国与丹麦争夺的目标，这一复杂情况使伊台斯所属民族的问题变得非常混乱。这个问题更复杂之处还在于：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是在皇朝合并时联合起来的，法律上石勒苏益格是丹麦的一个州，而荷尔斯泰因是日耳曼帝国的一个州。可以设想，即使伊台斯本人也很难确定自己的法律地位。文献资料证明，伊台斯居住在莫斯科时既与丹麦大使海因斯一直保持密切关系，同时也与他长期居住过的“德国侨民区”<sup>②</sup>的荷兰人和德国人一直关系密切。

情况可能是：伊台斯初来俄国时用的是荷兰姓——艾兹勃兰特，但按德语拼写则为伊兹勃兰特。看来伊兹勃兰特并没有附加“伊台斯”这个名字。例如，勃兰德总是彬彬有礼地称伊兹勃兰特为“使臣先生”，但他没有附加“伊台斯”这个名字。只是在旅游中国以后伊兹勃兰特才开始把自己的名字写作“伊兹勃兰特·伊台斯”。在致沙菲罗夫的献词中，他的签名附加了贵族的标志“德”。

对俄罗斯化的名字——叶利扎里——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可能在俄国有给外国人起俄国名字的习惯，也可能是外国人自己愿意在俄国政府供职，谋求高官厚禄。伊兹勃兰特早在出使中国前给沙皇的奏文中就已自称为叶利扎里。

---

<sup>①</sup> 见 J. 盖勃哈德：《尼古拉斯·康奈里斯·维特森先生的生平》，乌德勒支，1882 年，第 332 页。

<sup>②</sup> 应该指出，人们在广义上称该区为“德国侨民区”，意为“外国侨民区”。在保存下来的当时的书信中英国人称该区为“荷兰侨民区”。（R.N. 贝恩：《彼得大帝的学生》，威斯特明斯特，1897 年，第 23 页）。

\* \* \*

只有根据俄国资料才能比较清楚地了解伊台斯的生平、事业和性格。因为他在青年时代就来到俄国，在俄国度过了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

前面已经提到，汉宁根据荷尔斯泰因的档案查明了伊台斯出生的准确日期。彼得堡公共图书馆馆员波谢特对此也很感兴趣，他出版了一些著作，我们在下面还将多次引用<sup>①</sup>。

根据汉宁从格吕克施塔特市档案馆得到的文件判断，小商人伊泽勃兰德·伊台斯(父)于1653年宣誓后被接纳为该城市民。文件中两次提到伊台斯是荷兰人。他的儿子生于1657年，取名埃别尔加尔德·伊兹勃兰特·伊台斯。从教堂的登记册中可以明显看出，这一家人信奉新教(喀尔文教)。在格吕克施塔特新教教堂的登记册中保留着克劳津斯牧师1861年贴上的则一简记，其中写道：伊兹勃兰特·伊台斯，即后来彼得大帝派赴中国的使臣，1687年迁往俄国。同时还知道，1861年克劳津斯应科学院的请求，曾给彼得堡写来一份关于伊兹勃兰特·伊台斯的出身和受洗礼情况的证明信。遗憾的是在科学院档案中至今尚未找到这封证明信。

克劳津斯牧师的证明信大概在彼得堡的波谢特手中。波谢特写道：伊台斯生于1657年，并在当年受洗礼，教堂的登记册和1687年7月9日格吕克施塔特的州长、市长及市政会议所摘抄的证明材料都可证实这一点。材料说明，伊台斯的亲属是正直的、洁身自好的人，伊台斯本人完全可以担任一切光荣职务，完全有资格加入行会和同业公会。

---

<sup>①</sup> M. 波谢特，《帕特里克·戈尔顿将军日记》，I—III，彼得堡，1851年；M. 波谢特，《陆军将军和海军上将弗兰茨·列福尔特，他的生平和时代》，I—II，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866年。

1687年伊台斯住在汉堡，经营大宗的贸易业务<sup>①</sup>。

我们掌握的另一份可靠文件是伊台斯的奏文（奏文上的批示日期是1692年1月29日）。在奏文中伊台斯请求派他去中国进行贸易。他指出，他于1677年“乘船航行到阿尔汉格尔斯克，作为一个青年人，谋求在商业中发迹”<sup>②</sup>。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伊台斯早在1677年二十岁时就首次航行到阿尔汉格尔斯克，同俄国进行贸易，此后多年继续经营商业。当时德国北部的港口，特别是汉堡，不仅在与波罗的海和北海沿岸国家的贸易中起着很大的作用，而且在与地中海沿岸国家的贸易中也起着很大的作用。可能伊台斯为了处理贸易事务还常去意大利，因为他在回答中国皇帝问及他通晓什么语言时也提到了意大利语。

伊台斯的奏文是1692年呈递的，这一事实使我们有根据认为，伊台斯同俄国进行贸易将近十五年（从1677年到1692年）。

他在这一奏文中指出，自首次航行到阿尔汉格尔斯克后，十五年来他同俄国进行的贸易一直很顺利。1688年奉沙皇谕旨向伊台斯购买了各种宫廷用品，付给他七十一一个半卢布。谕旨中提到饰有驼鸟羽毛的帽子、银器、象牙制品、水晶器皿<sup>③</sup>。

看来伊台斯在1687到1692年就已迁居俄国。档案中保存着一份文件，证明伊兹勃兰特在莫斯科有一幢房子和大宗地产<sup>④</sup>。

综合现有材料，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从1677年至1687年伊兹

---

① 见 M. 波谢特：《陆军将军和海军上将弗兰茨·列福尔特，他的生平和时代》，II，第65—66页。

② 见国立中央古代文书档案馆，卷宗 №62，俄中关系，第14册，第1张。

③ 《沙皇伊万和彼得以及索菲亚公主因向外商汉堡人叶利扎里·伊兹勃兰特购得御用海外珍品，救命付款的谕令。1796年3月7日》（《莫斯科大学俄罗斯历史文物学会报告》，6，莫斯科，1887年，第177、178页）。

④ 国立中央古代文书档案馆，卷宗 №62，俄中关系，第14册，第66、67张。

勃兰特同俄国进行贸易，视商务需要，他时而住在俄国，时而住在国外，1687年还住在汉堡，1687—1692年住在莫斯科，很少外出。

根据该奏文判断，伊兹勃兰特·伊台斯经营的贸易业务规模不小，因为他在奏文中写道：“我上缴皇帝陛下国库商业税六千卢布。”

伊兹勃兰特作为巨商在莫斯科德国侨民区居显要地位，厕身该区上层人物之林。众所周知，这些人士都是与沙皇彼得很接近的。1690年12月19日彼得的统帅之一帕特利克·戈尔顿访问了伊台斯；1691年3月9日戈尔顿陪同沙皇在伊兹勃兰特家里共进午餐<sup>①</sup>。

M. M. 鲍戈斯洛夫斯基在记述彼得与德国侨民区的密切联系时说：“1691年彼得除了两个最亲密的朋友戈尔顿和列福尔特以外，还常去伊兹勃兰特、蒙斯、麦涅齐、克尼佩尔、冯·克列尔、塔乌贝尔特等人处。”1692年3月2日伊台斯启程去中国的前夕，戈尔顿出席了伊台斯举行的宴会<sup>②</sup>。伊台斯在德国侨民区的显要地位，广阔的交际，与沙皇的密切关系，使他得以受政府的重托出使中国。1695年他自中国返回。

伊台斯很想作这次中国之行，因为他希望重振他业已衰败的事业。根据保存下来的书信可以知道，斯特拉斯堡和汉堡的商行一再要求他偿还债务，使他颇为烦恼<sup>③</sup>。

伊台斯出使中国时，已是债台高筑，境况极为不妙。他怀着牟取暴利的希望，答应重重酬谢所有债主<sup>④</sup>。伊台斯走后，他的业务

① M. 波谢特：《帕特利克·戈尔顿将军日记》，II，第327、336页。

② M. M. 鲍戈斯洛夫斯基：《彼得一世》，I，莫斯科，1940年，第135页；M. 波谢特：《帕特利克·戈尔顿将军日记》，II，第369页。

③ M. 波谢特：《陆军将军和海军上将弗兰茨·列福尔特，他的生平和时代》，II，第67页。

④ 同上，第64页。

由列福尔特负责照管<sup>①</sup>。现在还保存着列福尔特写给斯特拉斯堡商人、伊台斯的债主佩尔德罗的信件。这些信件保证，一俟伊兹勃兰特从中国归来，当即偿清债务<sup>②</sup>。

1695年伊台斯从中国回到莫斯科。他不象戈洛文那样走运，戈洛文和满清官员进行涅尔琴斯克谈判<sup>③</sup>后得到了重赏；但也不象斯帕法里那么倒霉，斯帕法里回来后即遭到追究，不得不驳斥向他提出的指控。

关于政府和伊兹勃兰特·伊台斯使团的关系，官方文件里未有任何记载。伏尔泰编纂彼得时代的俄国历史时，在彼得堡寄给他的一些俄国历史手稿中，在1695年大事记里我们查到了下列几句话：“2月。陛下召见出使中国后返回莫斯科的伊兹勃兰特先生。各种奇闻和有关他所进行的谈判的报告。三年旅行。见他以荷兰文和德文刊印的中国宫廷见闻。”<sup>④</sup>

在信件和回忆录中保存着同时代人对伊台斯中国之行的评论。帕特里克·戈尔顿在日记中指出：“1695年2月1日出使中国的使臣叶利扎尔·伊兹勃兰德已经回来。”<sup>⑤</sup>

1695年2月1日寄到日内瓦的一封信中写道：“塞涅比埃内

---

① 1692年，在伊台斯去中国之后几个月，在列福尔特家里曾庆祝伊台斯的妹妹伊丽莎白和来自日内瓦的列福尔特的亲属菲利普·塞涅比埃的婚礼。因此伊台斯与列福尔特有亲戚关系。

② M. 波谢特：《陆军将军和海军上将弗兰茨·列福尔特，他的生平和时代》，II，第66页。

③ 即尼布楚谈判。——译者

④ 列宁格勒国立 M. E. 萨尔蒂柯夫—谢德林公共图书馆，《伏尔泰藏书。关于俄国的手稿》，14，№144，第5卷，1695年，第2页。《基森男爵撰写的1695—1709年彼得一世皇帝的记事簿》：“今年，1695年2月1日，大君主派往中国的使臣、外籍人士伊兹勃兰特返回莫斯科，他撰写了报告。出使记事和途中见闻用荷兰文印行。”（引自 Ф. 图曼斯基编：《有关彼得大帝的生平和事业的各种札记和著作汇编》，III，圣彼得堡，1782年，第6页）。

⑤ 波谢特：《帕特里克·戈尔顿将军日记》，II，第506页。

弟，伊兹勃兰特先生已从中国回来，根据一切情况判断，他在中国发了财，因此人们可以相信，他所有的债主都不会遭受损失。”对此列福尔特还写道：“他（伊兹勃兰特）的旅行是成功的，尽管现在还不能准确地估定他的财产。他对我说，他将努力满足他的所有债主。他带回一些精美的宝石，其中有一块蓝宝石，据说价值一万塔列尔<sup>①</sup>，重二十佐洛特尼克<sup>②</sup>，色泽极佳。”<sup>③</sup>

中国之行是否使伊兹勃兰特发了财，获利多少，当然不能准确估定。但是正如波谢特所记述的：“他用从中国带回来的东西向各界人士送了厚礼”，举行了多次盛大宴会，沙皇每次都亲自出席<sup>④</sup>。戈尔顿指出：“1695年2月20日，叶利扎尔·伊兹勃兰特送给我两段中国绸缎，六套茶杯茶碟和九个式样不同、大小不一的深盘，全是瓷器”<sup>⑤</sup>。

关于伊台斯发财的传闻引起了接近沙皇的人们再去中国一行的愿望。从日内瓦来莫斯科谋求美差的弗兰茨·列福尔特的侄子皮埃尔·列福尔特和他的伙伴瑞士商人格尔瓦根最早表示了这种愿望。在莫斯科，人们都已知道，伊台斯从中国带回许多货物，主要是宝石。格尔瓦根结识了伊台斯，并与他成交了几宗交易。

格尔瓦根和皮埃尔·列福尔特向往去中国，因此皮埃尔·列福尔特没有入军界任职。1695年3月22日<sup>⑥</sup>，列福尔特在给日内瓦的兄弟（皮埃尔的父亲）的信中说：“我希望他和格尔瓦根先生能去中国旅行”。1696年2月28日皮埃尔·列福尔特给父亲写信说，他已决定去中国，沙皇已预支他一万五千塔列尔，并可望得到

① 塔列尔——德国银币，1907年以前等于三马克。——译者

② 佐洛特尼克——旧俄重量单位，等于4.266克。——译者

③ M. 波谢特，《陆军将军和海军上将弗兰茨·列福尔特，他的生平和时代》，II，第67页。

④ 同上，II，第68页。

⑤ M. 波谢特，《帕特里克·戈尔顿将军日记》，II，第511页。

叔父的帮助。但他并未成行，大概是因为弗兰茨·列福尔特拒绝为他向沙皇请求。

沙皇彼得和伊台斯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彼得在亚速海远征途中(1695年10月21日)致函维尼乌斯，嘱令他向罗莫达诺夫斯基、吉洪·斯特列什涅夫、加夫利尔·戈洛夫金(都是国家的显赫人物)和叶利扎里·伊兹勃兰特代致问候并转告他们，来信均已收到，但无暇作复。维尼乌斯在同年11月5日致彼得的复信中证实，“已向叶利扎里·伊兹勃兰特转达问候。”<sup>①</sup>

保存下来的其他笔记证明，伊兹勃兰特过的是上流社会的生活。戈尔顿记述：“1696年2月14日沙皇陛下及其他人士在伊兹勃兰特家里共进晚餐。”<sup>②</sup>1697年1月24日戈尔顿又写道，庆贺伊兹勃兰特与德国侨民区巨商缪恩特尔之女结婚<sup>③</sup>。同日莫斯科福音教派教堂的登记册上也有相应的记载：“曾觐见中国皇帝的俄国使臣埃瓦尔特·伊兹勃兰德和安娜·缪恩特尔举行了婚礼。”<sup>④</sup>

上面已提到，伊台斯与莫斯科外交界上层人物常有来往，其中包括勃兰登堡的公使冯·恰普利奇。伊台斯就是通过他将自己出使中国的简记寄往国外的。

为了评价伊台斯在十七世纪末同俄国社交界各界人士的相互关系，研究一下伊台斯在莫斯科、主要是在德国侨民区长期居住的大量外籍人士中所占的地位是有益的。

---

① 《彼得大帝书信和文件集》，I，1688—1701年，圣彼得堡，1887年，第53、545页。

② 见M.波谢特：《帕特里克·戈尔顿将军日记》，II，第9、89页。

③ 亨利·缪恩特尔(大概是利佛兰底亚瑞典人)和伊台斯是商界同仁。缪恩特尔与另一个外国人佩特尔·凯埃特(外交事务衙门翻译官)合资开设杜哈宁诺的一座玻璃工厂，后该厂归亨利·缪恩特尔单独占有(E.阿姆布尔格：《麦塞里家族》，载《俄国经济史研究》，IV，基森，1957年，第201页。

④ A. W. 弗希纳：《莫斯科福音会编年史》，I，莫斯科，1876年，第461页。

莫斯科的外国侨民并不是属于同一民族，宗教信仰也不相同。在外国人中有天主教徒和包括喀尔文教徒在内的新教徒。俄国政府对待他们的态度也不一样。在莫斯科，天主教徒受到严密的监视，——诚然，这主要不是由于教义上的意见分歧（彼得并不想盲目保护教会人士的利益），而是出于重大的国家利益。

十七世纪天主教会的首脑与其说是罗马教皇，不如说是法国国王。法国国王实行反对改革的政策，并为夺取欧洲大陆的霸权而斗争。这场斗争的矛头指向信仰新教的国家——英国、荷兰和日耳曼诸国；法国的同盟国有波兰、瑞典、土耳其（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初的俄国历史中，同法国的这个或那个盟国战争频仍）。国际矛盾在莫斯科外籍人士中也有反应。在德国侨民区力量很弱的天主教派与新教派之间进行着隐蔽激烈的斗争。在伊台斯迁居俄国的最初几年，喀尔文教徒组成的新教派中最有势力的集团是由弗兰茨·列福尔特领导的。

耶稣会教士弗兰齐斯克·埃米利安在1699年6月23日的信中写道：“无法形容我教派最凶恶的敌人喀尔文派教徒在列福尔特生前是何等趾高气扬。无法描写，这位列福尔特是罗马教皇和耶稣会教士何等凶恶的敌人。”<sup>①</sup> 加入反天主教新教派的有普通的新教徒、住在德国侨民区的教民、荷、德、英等国商人、军官和手艺人。他们都得到有势力的外国外交官们强有力的支持，如勃兰登堡大使恰普利奇、丹麦大使海因斯、在俄国居住了二十多年有极大影响的荷兰人冯·克列尔。由于英国和荷兰合并，冯·克列尔同时代表两个国家，实际上他领导着驻莫斯科外交官中的新教教派。1680年新教徒决定在莫斯科建筑一座新教堂，派代表到阿姆斯特丹去筹募款项。起初他们想求助于国会，但阿姆斯特丹市长、新教徒维

<sup>①</sup> 《十七世纪末和十八世纪初耶稣会教士关于俄罗斯的书信与报告》，圣彼得堡，1904年，第24页。